

「政權交替與外交轉型」學術研討會紀實

陳立樵 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自 2010 年起，「外交史研究群」打開了臺灣青年學者在中國外交史研究的發展空間。（註1）有鑑於國外學界在近現代中國外交史的研究已有深厚基礎，但存有大量近現代中國外交檔案的臺灣卻少有學者在這個領域深耕發展，故本研究群自成立之後便致力於充分利用國內外各類檔案，以形塑近現代中國的外交模式，也希望能在這個研究領域取得話語權。儘管外交史研究在臺灣已然式微，（註2）但本研究群在多年的努力之下，已有多項研究成果，成員也由最初的 9 人至今已經有近 30 人。

自 2011 年以來舉辦了 7 年的研討會，已經成為本研究群的「傳統」，不僅成員期待這一年一會，學界裡相關研究領域的前輩也都予以莫大的支持與鼓勵。本研究群感念政治大學人文中心長期以來給予的協助，除提供場地、經費之外，也讓每年年會的會議論文都能出版成專書，作為本研究群成員在學術研究方面完善的發表平臺。截至目前為止，已出版 6 本專書，依序是《多元視野下的中華民國外交》（2012）、《國際法在中國的詮釋與運用》（2012）、《國際秩序與中國外交的形塑》（2013）、《近代中國的中外衝突與肆應》（2014）、《全球視野下的中國外交史論》（2016）、《近代中國外交的大歷史與小歷史》（2017）。此外，尚有兩本專書論文即將出版。

為了推廣外交史研究風氣，本研究群曾分別在 2015 年 5 月 15 日、2016 年 10 月 21

日，於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了兩屆「東亞外交史的新視野——外交史研究的新見解與展望」研討會，提供對外交史研究有興趣的年輕學者發聲的機會。兩次會議都有熱烈且精彩的討論，這代表本研究群不僅在自身的發表有所成果，也有能力搭起學術交流的橋樑。往後這樣的會議，本研究群仍有繼續舉辦的企圖心。

2017年1月20日，本研究群取得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補助，假政治大學社資中心舉辦了「政權交替與外交轉型」學術研討會。主題之發想與近期國家的局勢發展有關，此時正處於政權交替時期，而這必然會讓既有的外交政策有所調整。本研究群雖不討論現今的局勢變遷，但試圖在審視歷史之後，進而思考往後國家外交可能發展的方向。本次會議受到退休大使沈呂巡之注意，大使在開幕致詞時表示，外交史研究不僅對學術很重要，對於外交官處理當下局勢也很重要。會議之中，沈大使也給予許多珍貴的看法。

本會議的第一場次為「時局變遷中的外交轉型」。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任天豪發表〈鼎革之際的外交官世代轉型——從胡惟德的仕宦經驗談起〉，探討清末民初的外交官世代交替與區分的現象，胡惟德是這時期相當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參與過清帝遜位一事，為政權交替過程中的一分子。而這時的中國外交人員不單只是如西方以外交的專業來處理外交事務，對政

治事務也有其影響力。不過，胡惟德也懂得讓專業人員來處理事情，有「主動退讓」的態度，以適度的影響力來協助他人。從他的經歷之中，可看到中國外交「現代化」的「內化」過程。

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陳立樵的〈一次大戰與中國的阿富汗人案（1916-1921）〉一文，指出近現代中國外交的研究，對於中國與東亞、歐美的關係頗多關注，但缺乏中國與西亞外交關係的研究。儘管中國與西亞國家的關係淡薄，但仍有一些案例可以看出中國對西亞外交的態度與立場。本文探討一次大戰期間，中國在袁世凱放棄帝制、宣布參戰這樣政權交替與外交轉型的過程中，對於新疆發生的阿富汗人案，北京政府與新疆省長楊增新堅持對阿富汗人採取「無約國人待遇」原則，即視同中國人看待。而英國領事雖然有意介入，但中國致力於維護主權，也意圖降低英國在中國事務的影響力。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應俊豪發表〈一戰後美國駐華使領對華洋衝突問題的態度與因應之道〉，提到了美國在一戰時期具有影響國際局勢的地位，如十四項和平建議，而對華政策也會影響其他列強在中國的既得利益。本文不談美國華府（上層）外交人員的角度，而是以美國駐華使領（下層）的角度來思考美國的對華政策，特別針對3個案例，如1920年九江英國租界華籍苦力工人暴動案、1920年雲南的美國

傳教士遭中國土匪綁架案、1920年華北地區北京寶坻教民迫害案，可看到美國認同中國的民族自決，也不採以往強權的「砲艦外交」(Gunboat Diplomacy)來解決問題，進一步還表現出對中國主權之尊重。

第二場次為「區域管理下的外交轉型」。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助理教授呂慎華發表〈從中國屬邦到他國屬地——清末韓民越壘問題的性質與轉變〉一文，討論清末民初時，中國東北地區朝鮮人民越界的問題。非法越界原應就地處決、遣返、收編，但朝鮮為中國屬國，而中國存有天朝觀念，對於朝鮮人民越界一事，反而認為需要給予優惠待遇。然而，當越界問題愈加嚴重時，清朝就需要有進一步的作法，例如剃髮、換服裝，以利管理。朝鮮官方不同意，畢竟人民越界並非要歸屬中國。在中、朝邊界之間，就一直有管轄權的爭議。1910年日韓合併之後，進入中國境內的朝鮮人民反而連帶享有日本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韓民越界成為中日間的糾紛。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學術交流組編輯兼組長黃文德的〈廟街事件後北洋政府海軍在西伯利亞之護僑與江防——以吉黑江防艦隊為例(1920-1921)〉一文，探討1920年3月日本與俄國的廟街事件之後，中國藉由江防、護僑、外交等方式，解決黑龍江與松花江交界的軍艦航權問題。在這過程之中，可看到北京政府結合海軍與外交人員在維護國權上的努力。然而，在廟街事件

之後，俄國影響力逐漸擴大，江防艦將領王崇文認為這牽涉俄國主權，不得貿然行事。不過，這反而意味著中國已然喪失收回航行利權的機會。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應用服務組研究員許峰源發表〈中華民國對太平島經營策略的轉折(1945-1960)〉，強調從冷戰視角來看太平島的問題。從二次大戰結束以來中國的領土爭議談起，著重在中華民國與菲律賓之間的關係。冷戰爆發之後，太平島捲入南海局勢之中。美國與日本的關係已出現變化，使得美國也得涉入南海問題，問題出在「舊金山和約」，日本必須放棄西沙、南沙群島，卻沒有指出實質歸屬，陷入地位未定論的爭議之中。菲律賓也很關注南海問題，質疑臺灣能否擁有南海主權。於是，南沙群島主權未定論，出現多國各自解釋的爭議。

第三場次為「劇變情勢裡的外交轉型」。臺北市立南湖高中歷史科教師蔡振豐的〈歐戰期間北京政府對領海中立事務之籌備與肆應(1914-1917)〉一文，強調中國在一次大戰期間長達3年的局外中立時期，歷史原貌尚未釐清，但從史料耙梳之中，可看到當時北京政府貫徹中立政策的決心。學界既有的觀點，忽視北京政府中立的成效，尤其是認為弱國無外交。其實問題在於外在局勢之影響，例如交戰國的外交壓力，還有各國對於國際法規有不同見解的關係。面對惡劣的外在環境，北京政府在有限度的情況

中致力維持了3年的中立，實屬不易。

俄羅斯國立莫斯科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候選人黃家廉〈無法邁向友好的同盟條約——1945年中華民國對蘇談判的盲區〉一文中談到，中國與蘇聯雙方的關係自1912年以來總是衝突多過合作，1945年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也沒有維持長久，4年後便發生中國在聯合國的控蘇案。問題在於，中國認為在1945年開始與蘇聯發展友好關係，能夠帶來中國戰後的和平與穩定，但內部卻鮮少討論如何進行。另一方面，英、美、蘇的「蘇聯對日作戰協定」對中國主權也影響甚大。在中國的目標不明確、外在局勢劇變的情況下，中蘇外交出現盲區，也造成後續中蘇的對立關係。

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蕭道中的〈美國與臺灣地位問題的起源：1950年聯合國「臺灣問題案」研究〉一文，有別於以往的研究重視個別問題與政府立場，而是試圖從冷戰史的角度，以各國文件來重構1950年「臺灣問題案」的歷史場景。臺灣由中華民國治理本是有歷史傳統，也有二戰後戰勝國的指令，其合法性本應無須質疑，但隨著美蘇冷戰展開，美國得重新思考在西太平洋的戰略佈局，臺灣便需要做另外安排，而且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取得優勢，也令美國要有避免臺灣赤化的舉動。當共產黨在中國正式掌握權力，又於韓戰爆發而美國要保衛臺灣的情況之下，中共向聯合國安理會控訴美國侵略臺灣，美國也就順勢在聯合

國提出「臺灣問題案」。由此可見，臺灣問題呈現的是冷戰時期東亞國際政治的複雜面貌。

第四場次是「戰後新局面的外交轉型」。發表人劍橋大學基督聖體學院博士候選人陳冠任的文章“US Naval Deployment in Maritime East Asia, 1945-1949”，指出探討美國於二戰期間對於海洋興趣的由來、美國在戰後於西太平洋的軍事部署、聯司令部計畫以及之後的相關議題。1937年後日本在西太平洋的地位日趨穩固，使得美國意識到保持太平洋通路暢通的必要性，唯有如此才能贏得對日本戰爭。戰爭結束之後，日本戰敗、英國沒落，美國就站上了整個太平洋獨霸的地位，也就必須調整在西太平洋的部署。而美國視東亞海洋為一個整體，成立相互聯繫的系統，以控管東亞海洋，也讓美國通往各地的管道更加暢通。然而，1949年國共內戰的結果，讓美國失去了中國海岸線，也威脅到其保持海洋通道暢通的企圖。

中國國民黨黨史館主任王文隆〈中華民國外交部的1949〉一文，指出1949年國共內戰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在12月初遷至臺灣，外交部在這個時局變革之際，有別於過去政權更迭的經驗，面臨了相當不一樣的衝擊。於是，人員做了什麼選擇，還有後續的發展與結果就成了值得討論的議題。主要的特點在於，中華民國外交部的遷徙，使得大部分人員不在國內，所以有域外觀察的機會。而韓戰爆發，也讓許多原本欲承認中共

的國家繼續與中華民國維持關係，讓中華民國遷臺後在外交方面還有喘息空間。投共的外交人員卻紛紛失去工作，有些人受到政治迫害，反而不如遷臺人員。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袁興言的〈韓戰停戰前後美援臺海機構的交替與東南沿海游擊部隊的轉型（1951-1955）〉，呈現 1950 年代以金門溪邊村為基地的中華民國浙閩反共救國軍之諸多活動與變化，特別是該部隊與韓戰、美國情報機構之間的關係。浙閩反共救國軍本是由江浙閩粵人民組成的游擊部隊，在 1949 年對中共在地方治理上造成極大壓力。美國情報局的外圍機構西方企業公司給予游擊部隊可靠的支援。不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圍剿、中華民國封閉東南沿岸的情況之下，雙方之間宛如拉下鐵幕。游擊隊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除了自力更生，也只能取得美方有限的資源。

自 2015 年年會開始，每年的會議除論文討論之外，都安排本研究群成員的新書發表。今年由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教師楊凡逸發表他在 2016 年 9 月出版的著作《折衝內外：唐紹儀與近代中國的政治外交（1882-1938）》（東方出版社）。楊凡逸談到唐紹儀早期在朝鮮積累的外交經驗，日後運用在確保中國對西藏、東北的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並收回過去中國所失去的路礦利權。唐的性格兼具理想性與現實性，其外交資歷受人敬重。不過，抗日戰爭爆發之後，日本試圖運用他的影響力來成立偽政

權，也種下他遭到刺殺的禍根。

綜合座談的部分，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張啟雄給予相當精闢的講評。張研究員強調東方與西方之間有不同的國際秩序原理，各有各的獨特性，這也使得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觀察角度，兩者之間沒有對錯的問題，但不適合用西方的觀念來解釋東方。傳統的政權交替，例如明朝與清朝，都是天朝型的史觀，而民國之後就有中國型與西方型的差異。天朝的外交與西方外交也不一樣，明清之後中國要從傳統走向近代的過程中，會有一段過渡型的外交，不會是西方模式直接取代東方模式。張研究員指出，本研討會的諸多文章，應加強過渡型的討論，而且應以東方角度來詮釋中國外交。當然學界也應該加強東西方歷史文化價值的研究風氣，除了要指出轉變的過程，還有東西方作法之差異，讓外交史研究更周全，也更有創意。

會議最後，東海大學歷史系主任唐啟華教授給予本研究群高度肯定。或如政大人文中心周惠民主任在會議開始時說的，外交史研究非常重要，透過外交方面的研究，可以理解許多歷史上重要事件的發展過程。師長贈言，讓本研究群更有努力下去的動力，以找尋且定義近現代中國的外交模式與意涵。2018 年的會議目前已在籌備中，將以「和戰之際的清末外交」為題，繼續為近現代中國外交史的研究奉獻心力。

【註釋】

1. 原定名為「中華民國外交史研究群」，後考慮到有研究清末外交的成員加入，故改為「外交史青年學者研究群」，爾後加入了政治大學人文中心的「現代中國的形塑」研究計畫，於是至目前為止，本研究群以「中外關係與近現代
2. 中國形塑」之名與外界交流與對話。
見任天豪，〈中外關係與「近現代中國的形塑」研究團隊的研究理念與發展〉，《國史研究通訊》，第 10 期（2016 年 6 月），頁 172-179。